

The  
Frontier of  
Literature  
No.9

文学前沿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 主办



The  
Frontier of  
Literature  
No.9

文学前沿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 主办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前沿(第9辑)/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左东岭主编.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12  
ISBN 7-80060-342-3

I.文… II.①首…②左… III.文学理论 IV.I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00527号

责任编辑:洪文雄

封面设计:周毅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开本尺寸:965×1270 1/16

印 张:20.625

字 数:283千字

版 次:2004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0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册

定 价:24.00元

# 目 录

## ·文艺学学科建设·

- 陶东风 开放文学理论(3)  
程 凯 传统文论资源的近代转化:从  
《文学研究法》到《文学概论》(12)  
王 瑾 学科自律·边缘危机·社会干预  
——关于文学理论学科边界的一点思考(30)  
邱运华 交往意识与学科边界的突破  
——巴赫金关于文艺学学科建设的思想(38)

## ·中国诗歌研究·

- 刘崇德、徐文武 燕乐声乐化与词体的产生(53)  
许继起 鼓吹十二案考释  
——追溯一种失落的舞台艺术(72)  
张晓梅 文人与怨妇:从怨妇诗看古代  
诗歌创作的“男子作闺音”现象(85)  
岳 珍 隋唐燕乐小曲考论  
——关于词体发生方式的研究(99)  
嵇保中 杨万里的昆虫诗探微(113)  
任广世 【北骂玉郎带上小楼】及【渔灯儿】套源流考(119)  
吴光正 道情曲目鼻祖《韩仙传》及其传播考论  
——兼谈学界关于元明两代小说、戏剧的文学史建构(140)  
祁海文 从“先王乐教”到“制礼作乐”  
——关于中国美育思想起源与产生的探讨(153)  
刘立志 从著述体式看汉代《诗经》学的发展与演进(169)  
贾奋然 从目录学、总集编撰到文体分类学(182)  
廉水杰 “清”的审美理想在唐代诗论中的发展(193)  
朴均雨 渔洋“神韵”说的哲学美学基础浅析(207)  
孟 泽 “两歧的”与“一致的”诗学  
——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的前提、依据与意义(217)

·文学批评·

- 高楠 文学批评的狂欢(233)  
王南 文学批评的“文学性”(248)  
赵慧平 对于文学批评概念的再研究(254)  
宋一苇 “后”时代的文学理论何以可能(268)  
肖莎 语言观与文学批评:解构主义前与后(274)  
王妍慧 普希金圣经情结的精神实质论(290)  
王宗琥 论表现主义倾向在 20 世纪初  
俄罗斯文学中的勃兴(305)

## Contents

###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Studies

- Tao Dongfeng    Opening Literary Theory (3)
- Cheng Kai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Resources of Literary Theory: From the Methods of  
Literary Studies to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12)
- Wang Jing    Disciplinary Autonomy · Marginal  
Crisis · Social Intervention – Contemplation  
on Disciplinary Border of Literary Theory (30)
- Qiu Yunhua     Communicative Consciousness and the  
Breakthrough of Disciplinary Border Bakhtin's  
Thoughts on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Studies (38)

### Studies on Chinese Poetry

- Liu Chongde & Xu Wenwu                                        The Vocalization  
of Yan Music and the Emergence of Ci Poetry (53)
- Xu Jiqi    Verification and Explanation  
of Twelve Cases of Drum and Trumpet  
Ballads – Tracing Back to a Lost Stagecraft (72)
- Zhang Xiaomei     Literati and Complaining Women:  
“Feminine Poems written by Men” Phenomenon in  
Ancient Poetry as Viewed from Complaining Women Poems (85)
- Yue Zhen    Verification and Criticism  
on Begatelle in Sui and Tang Dynasty  
– Study on Originating Modes of Ci Poetry Style (99)
- Ji Baozhong       A Probe into Yang Wanli's Insect Poetry (113)
- Ren Guangshi    Textual Research of Divertimento'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ursing the Man Named Yu  
North about and Going Upstairs & Fishing Lanterns (119)
- Wu Guangzheng     The Originator of Lyric Yuan Verse,

- The Story of Han Immortal and Its  
Transmission –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Novels and Play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140)
- Qi Haiwen From “Earlier King  
Enjoying Teaching” to “Prescribing  
Courtesy and Composing Music” –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Aesthetic Education Thoughts(153)
- Liu Lizhi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vement of Poetry Classic Studies in  
Han Dynasty as Viewed from Narrative Style (169)
- Jia Fenran From Bibliography and  
General Collection Compilation to Style Taxology(182)
- Lian Shuijie The Development of Aesthetic  
Ideal of “Qing” in Poetics of Tang Dynasty (193)
- Piao Junyu An Analysis of Philosophical and Aesthetic  
Basis of Yu Yang’s “Romantic Charm” Theory (207)
- Meng Ze “Divergent” and “Coherent” Poetics – The  
Premise, Evidence and Meaning of Mutual  
Glossing between Wang Guowei’s and Lu Xun’s Poetics (217)

### Literary Criticism

- Gao Nan The Orgy of Literary Criticism (233)
- Wang Nan The “Literariness” of Literary Criticism (248)
- Zhao Huiping Further Studies on  
the Concept of Literary Criticism (254)
- Song YiWei The Possibility of  
Literary Theory in “Post – ” Era (268)
- Xiao Sha Linguistic Idea and Literary  
Criticism: Before and After Deconstruction (274)
- Wang Yanhui On Spiritual Essence of  
Pushkin’s Biblical Complex (290)
- Wang Zonghu The Rise of Expressionist Tendency within  
Russian Literature at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305)

# · 文艺学学科建设 ·



文学前沿

---

—

1963年,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英国文学教授、一年后成为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首任主任的霍加特,发表了教授就职演说。他是诗人奥登(W·H·Auden)的研究专家,但是大家都知道他的成就主要并不在奥登研究方面,其研究也不符合当时英国文学研究界的所谓学科规范,且超出了所谓文学研究的学科边界。早在1957年,霍加特就出版了他的巨著《识字能力的用途:工人阶级生活面面观——特别参照出版物与娱乐业》(The Uses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 - Class Lif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ublications and Entertainments)。据说此书至今还在重印并不断被引用,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经典。但它却是无法归入任何学科的一本奇书。霍加特后来回忆说:“我所遇到的英文系的许多老师对此书保持沉默,好像议政厅的边门跑出一只讨厌的老鼠带入了奇棺难闻的东西。”<sup>①</sup>而社会学家则认为它不法地闯入了自己的跑马场,对其极为个人化的自传式写法深不以为然。

此书的上半部分写二战以后英国里兹周围的工人阶级生活,第二部分则对于包括拳击、流行音乐、“下流”杂志、性与暴力小说等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新现象进行了广泛批评。它既不遵守传统的社会学研究题材与方法,也与正统文学批评相去甚远。不但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而且夹杂了许多个人的童年记忆与经验。它名义上是一个文学批评家的作品,但是研究对象却远远超出了小说诗歌等文学类型,涉及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性格特征、大众传媒、消费主义、青年文化等等。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教授评论说:“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在任何学

科意义上定位它,那么,我们可以说,它正从文学的领域突入各种新的领域——对于战后的英国日常生活具有显著影响的那些新领域。”<sup>②</sup>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此书关心的虽然是社会学的核心问题——社会变迁,但是在这里却找不到主流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然而一个不可否定的事实是:工人阶级本身非常喜欢这本书。韦伯斯特曾经采访过一个15岁开始就在铁路上干活、后来上了大学的工人弗兰克,在谈到这本书的时候,弗兰克眼睛放光兴奋地说:“(在这本书中)你能够听到血肉丰满的人的声音并感受到他们的存在,你可以通过绝大多数社会学不能提供的方式进入现场。”<sup>③</sup>

虽然按照霍加特的计划,中心的研究重点是流行歌曲、摄影、时装、广告、电视秀等大众文化,但是他创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本意却并不是要取消文学研究而只是要扩展其边界。据说他当时曾经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文学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sup>④</sup>上面提到的霍加特的就职演说发表在他的文集《相互言说》(Speaking to Each Other)的第二卷,这卷的副标题就叫做“论文学”(About Literature)。更有意思的是,文化研究中心成立的时候据说只有两个人,除了英文教授霍加特外,另外一个则是英语文学的研究生、牙买加人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霍尔在成为《新左派评论》杂志的编辑之前做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由此可见文化研究在起源时就与文学研究关系“暧昧”。如果说对于文化研究的文学胎记的辨认还不能充分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后来在后殖民研究领域卓然成家的赛伊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都是文学批评家出身难道也是偶然的?其实,文化研究创始人及其后继者的雄心之一就是扩展闻学研究的边界,同时他们也坚信文学研究对于文化研究多有裨益。霍加特曾经指出:在当代研究文化中心的学术事业中,文学构成了其“最重要的因素”。正是在文学与文学研究的方法中,人们发现了“对于经验细节的关注”,从生活的表层感受到下面的丰富复杂的肌理。在1963年的演讲中,他充分肯定了文学与文学研究对于增强我们理解生活与经验的复杂性的重要作用。<sup>⑤</sup>其实,如果我们把历史追溯得更远一些,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对霍加特以及早期的威廉斯产生巨大影响的是正是文学批评家里维斯(F·R·Leavis),以至于有人认为可以把霍加特叫做“左派-里维斯主义者。”<sup>⑥</sup>这些人的共同点都是关注文本细读,都认为文学有助于理解我们的生活方式。

韦伯斯特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这些早期活动为切入点,

开始反思社会科学,包括文学研究的边界问题。他指出:学科是文化本身的复杂建构物,并非永恒的金科玉律。多数人都能够在知识论的水平上承认这点;但是在现实中,学科仍然是资源分配与身份定位的强有力因素。文化研究兴起以后,职业化的社会学家批评它以及其他有些社会学家偏离了学科规范,这个所谓“规范”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学科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的占支配地位的规定。然而这种规定带有人为性,与现实并不吻合。他指出:“现实本身内在地就是跨学科的,而人文学科的首要目的则是理解和解释正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sup>⑦</sup>任何学科的边界都是模糊、相对的,都会被“外人”进入;这种进入并不是什么坏事。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许多伟大发现正是这种进入的结果,是“外人”做出的;一个学科中的所谓“大师”常常受到其他学科的训练,比如社会学大师韦伯就曾经受到法律的长期训练。

## 二

我之所以从早期英国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开始我的讨论,是因为它与我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文艺学边界问题的思考紧密相关。从中国的现实语境看,我是从文艺学学科所置身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巨大变化感受到了文艺学学科扩展边界、调整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从我的学术资源看,主要是借鉴了西方的文化研究。传统的文艺学研究范式已经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文化/文艺活动新状况,这个事实恐怕很难否定。产业结构的变化、文化的大众化、商业化以及大众传播方式的普及以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等,打破了艺术(审美)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而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传统的经典文学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现象,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文艺学应该正视现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由于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艺术的活动方式的变化,作为文艺学研究范型和学科边界之合法性依据的文艺自主性观念在许多方面呈现出了自己的局限性。诸如:由于坚持自律性标准而导致文艺学的研究对象过于狭隘,不能把新出现的、复合型的文学艺术形式或审美活动的承载方式纳入研究视

野,由于固守文学的无功利性而无法深入揭示大众文化、日常生活文化的内在机制等。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在我看来就是对这种挑战的回应,也预示着文艺学转型的征兆。<sup>⑥</sup>

文艺学的学科边界也好,其研究对象与方法也好,乃至“文学”、“艺术”的概念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移动的变化的,它们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于那里等待人去发现的永恒实体,而是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力量的建构物。它们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建构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必然要改写文艺学的学科边界。著名的新批评家韦勒克在其名著《文学理论》为捍卫“正宗的”文学研究(所谓自律的“内部研究”)而付出了巨大努力,为此他力图证明“文学”是虚构性、想像性的作品,其特点在于以诗性方式使用语言。但是韦勒克的论证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甚至是循环论证的。比如在批评关于“文学是所有名著”(包括哲学的、政治学的等等)这个定义时,他指出:阅读名著对于教学而言虽然重要,但对于文学研究却是没有多少实用性的,因为文学是“想像性的作品”。这里,韦勒克虽然名义上是在寻找“文学”的定义,但实际上却已事先有了“文学”的定义(“想像性的文学”),所以才会得出不能把广义的“名著”当“文学”的结论。这个结论在论证“文学”是什么之前已经存在,也是在梳理辨析“文学”这个概念之前就已经预设好了。韦勒克对于文学之所以是“想像性作品”也没有给出充分的理由,而只是从语言的角度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诗性运用——关注符号本身——而不是科学运用以及日常运用(关注信息)。这个区分同样问题重重。他自己也难以否认学科与日常语言中同样有关注符号本身的,“文学”中的语言使用则常常也直接指向信息。因此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艺术与非艺术、文学与非文学的语言用法之间的区别是流动性的,没有绝对的界限。”<sup>⑦</sup>这使得他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含糊其辞,用“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似乎是最恰当的”这样的模糊表达。

非常有意思的是,韦勒克好不容易找到的“文学”定义在伊格尔顿那里中成为第一个受到质疑的定义。他指出,在实际的使用中,“文学”这个词所包含的东西远远超出了“想像性作品”的范围(比如17世纪“英国文学”就包括了培根的政论文),而且想像/真实、虚构/事实的区分本身就很成问题,也不合乎历史事实。文学也不是形式主义与新批评说的“对于日常普通语言的偏离”。伊格尔顿说:根本就不存在抽象的、本质化的“普通语

言”，牛津哲学家与码头工人的“普通语言”能一样吗？任何语言都由于使用者的阶级、性别、地区、种族身份的不同而不同。一个人的普通语言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陌生化语言”。显然，伊格尔顿并不认为文学有一成不变的本质特征，因此通过寻找所谓“内在本质”来定义文学根本行不通。文学并不是某些作品所展示的某一或某些“内在特质”，而是“人们把自己联系于作品的一种方式。”“在由于各种原因而被称为‘文学’的一切中，想分离出一些永恒的内在特征也许不太容易……文学根本就没有什么‘本质’。”<sup>⑧</sup>他引用约翰·M·艾里斯的话说，“文学”一词颇似“杂草”，“杂草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植物，而只是园丁出于某中理由想要除掉的任何一种植物。文学意味着相反的东西，它是人们出于某种理由而赋予其高度价值的任何一种作品。”当我们把“非实用性”当成文学的根本性标志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在把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的特征普遍化了，“我们也许正在把某种‘文学’概念作为一个普遍定义提出来，但是事实上它却具有历史的特定性。”<sup>⑨</sup>在我看来，伊格尔顿的思路与韦勒克的最大不同在于不事先在脑子里预设一个关于文学的本质主义定义，而是考察历史上的各种文学定义，然后分析其社会历史原因。他甚至大胆放言：“任何东西都能够成为文学，而任何一种被视为不可改变的和毫无疑问的文学——例如莎士比亚——又都能够不再成为文学。”这样，文学理论或文学研究也就没有什么固定的对象了，“以为文学研究就是研究一个稳定、明确的实体，一如昆虫学是研究各种昆虫，任何一种这样的信念都可以作为妄想而加以抛弃”，“如果说，文学是一组具有确定不变之价值的作品，以某些共同的内在特性为其标志，那么这种意义上的文学并不存在。”<sup>⑩</sup>说文学是价值判断意味着把文学看做是特定时期的人的特定的构造物，是与人的利益紧密牵连在一起的。这样的价值判断必然具有历史的可变性并且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

中国现代文艺学的学科历史也同样可以证明这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学科建制与中国现代大学一起浮出历史地表，但是文学理论学科边界却一直处于变动之中，这与人们对“文学”定义的变化联系在一起。1902年，《奏定大学章程》颁布，把大学分为预科、转科和大学院，大学院中又设立了“学门”（相当于现在的系科），其中有“中国文学门”。这大约是“中国文学”第一次成为独立的学科，而“中国文学门”下的“文学研究法”则可以视做最早的文艺学，但是其内容却包括了书法、音韵、训诂、修辞、文法、文体、历史等庞杂的知识，其方法则仍然属于从文字到

文章的古典治学思路,其对象也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文学”而是广义的文章。其研究的宗旨则侧重文章的实用价值,关注“文学与人事世道之关系,文学与国家之关系,文学与地理之关系,文学与世界考古之关系,文学与外交之关系,文学学习新理新法制造新器之关系”,用新批评的术语来说,属于典型的“外部研究”。这种情况在最早类似文学理论教材的讲义——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1916年刊行)中也有体现,此书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桐城派的“文艺学”,侧重于作文法,其论述的对象也是“文章”而非狭义的“文学”。诗、赋等所谓纯文学虽然包含其中却非常边缘化,其文学观念更是停留在“载道”、“明道”、“经世”等传统观念,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律的文学观念。到了刘永济的《文学论》(1922)虽然有了较为强烈的自律性意识,其对于文学的理解已经基本上合乎所谓的“现代理解”,有了哲学、科学、政治、文艺学等学科门类的划分,但是仍然把文字学与语言学的内容放在文艺学的范围中。此后的文艺学教材虽然一步步地接近文学的现代概念,但是却仍然存在多样化的格局。戴渭清、吕云彪的《新文学研究法》(1920)在追求文艺学的科学性的名义下把科学等同于数理化,认为研究文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生物、经济、病理、天文、地质等等。可见并未限于自律论的圈子。书中还设立有新文学与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历史学、理化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内容。在这里,我们不可能追溯文艺学的整个学科史,只是希望表明这一点:学科边界的划分带有极大的人为性与社会历史性。<sup>⑤</sup>

### 三

放眼来看,强调学科边界的人为性以及跨边界研究的必要性实际上是当今整个社会科学界的共识,不只是限于文艺学界。华勒斯坦等人写的报告《开放社会科学》更代表了这方面的重要努力。该报告指出:知识领域的分化是近代的事情。在17、18世纪,自然科学虽然逐步确立、明确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与方法,但与之相对的那个知识领域却依然模糊不清,连名称都十分混乱:“文科”“人文科学”“文学”“美文学”“哲学”“文化”“精神科学”,等等。<sup>⑥</sup>到18世纪晚期、19世纪,知识的学科化得到重大推进(因为现代大学在这个时候确立),但是当时的学科划分依然与今天有重大差别。按照该报告的描述,19世纪学科分类的大致情况是:一端是数学、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学科(包括物理学、

化学、生物学);另外一端是人文科学(或文学艺术),包括哲学、对于各种艺术形式与实践(文学、绘画、雕塑、音乐等)的研究等等。处于两端之间的是研究社会现实的知识,其中历史学接近文学艺术,“社会科学”则接近自然科学。可见,当时的所谓“文学艺术研究”差不多就是人文科学研究的同义词,而社会科学到底是什么则依然模糊不清。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名称虽然逐渐出现但是其自律性的程度并不高,其学科的归类也与现在不同,比如经济学有时被归在法学院,有时又被归入哲学院。

学科的制度化进程的一个基本方面,是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界进行界定。一般而言,这种界定总是从对象与方法(有时还加上目的)方面加以论证。截止到1945年,社会科学的建制化过程已经完成并牢固确立。但是华勒斯坦等人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表明:学科边界的确立却不是什么一劳永逸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内在的”学理可言。该研究表明,1945年以前所确立的社会科学的边界(研究对象与方法)到了1945年以后因为各种“外在的”原因而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如美国的崛起、人口的增长与生产力的提高、新社会运动、大学的扩展等),导致社会科学的对象与方法都随之变化。它不仅影响社会科学家对“什么问题最为紧迫”(对象问题)的理解,也影响到他们对“什么是处理它们的最恰当方法”(方法问题)的理解。区域研究、性别研究、族性研究等文化研究中的热点问题,都吸引了大量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以现实中的问题为核心而不是以既有学科的规范为准绳的局面正在形成。社会科学各个他学科相互渗透,出现了历史学的社会学科化(社会科学型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学化(历史社会学)等交叉学科,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的边界也越来越模糊。学科的重合和交叉产生的结果是双重的:“一方面,无论依据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几门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都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sup>⑧</sup>事实证明:所有的学科门类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划定自己的边界、论证自己的学科合法性,而是要反复地重新论证,这是因为“所有这类要求都自然而然地具有历史的特殊性,只有置身于特殊的社会系统中,才有可能理解它们。而且这些要求从来都是必须通过各种历史的、因而也是不可能经久的制度和实践来加以推行。”<sup>⑨</sup>

不仅社会科学内部是这样,甚至现代世界知识的三大划分



模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边界也在变得越来越模糊，自然科学的边界受到社会建构主义者的挑战，他们对自然科学实践提出了严肃的质疑。由于文化研究的兴起，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出现了社会科学的人文科学化和人文科学的社会科学化。这种科学交叉的情况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成果，比如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就不属于任何学科，但是却是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重要著作。

主要是受到福科的影响，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在思考学科与权力的关系。学科(discipline)这个词所包含的学科、学术领域、纪律、规训、戒律等多种含义开始，揭示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复杂关联。学科的划分不只是大学内部的事务，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实践形式，同时也不是知识本身的事务，而是具有深刻的利益牵连。正如有人指出的：知识的“分门划界有多种目的。当建立界限保护某学科时，边界就标志着所有者的领土，外人不得擅入，以便跟其他学科划清界限”，“当界限是用来指导学科规训的执业者时，分门划界就决定要包括哪些方法和理论，哪些要排除，哪些可以引进。”<sup>⑩</sup>不同的学科边界的渗透性是不同的，越是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整合性的学科边界就越稳定，也越封闭，其渗透性就越差。考虑到学科是社会规训实践，我们就应该将学科规训与其他的社会规训实践联系起来，揭示现代学科是一个更大的社会规范体系中的制约元素。

学科规范在行使权力的时候首先就是紧紧地控制他们的研究对象，通过自己炮制的统一化模式，来取代研究对象的多样存在。这样，如果要打破这种一体化封闭模式，就必须重新建构研究对象，这是学科改造工作最起码的条件。研究对象不是自在的存在，而是建构出来的。这种建构的目的难以避免地与特定学术群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具体到文学研究，它的制度化与边界的划定必将也已经导致对于某些重要的文学事实、文学经验以及研究文学的路径与方法的排除，从而不利于文学研究的发展。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学科应该具有积极而开放的胸怀，一种积极打破边界、扩展疆域的心态。我们可以从中外文学理论的历史中发现一个基本规律：文学理论的飞跃式发展常常发生在边界被打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积极“侵入”的时候，而这些开创性的大师则恰好多是文学研究的“外人”。只有开放文学理论才能发展文学理论。